



加力再出发——最高法深化改革进行时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一元复始，旭日始旦。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2年10月，新时代的第十个年头，民族复兴进行到关键一程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大发出新的动员令。

2023年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怎样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政法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一年来，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做深做实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从审判理念、审判机制、审判体系、审判管理等方面整体推进、系统落实，突出问题导向，努力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 东交民巷27号的那棵皂角树见证历史一刻
- 理念一新天地宽 从“蜜胶”知产第一案最高法判赔额最高到最高法首次挂牌督办执行和解看能动司法
- 如我在诉：信访窗口就是社情民意晴雨表
- 小案见民心：高额彩礼返还和46枚咸鸭蛋46张小票知假买假案例引领裁判规范
- “铁马冰河案”：彰显司法的理性和温度
- 少年审判三合一机制 拉开少审改革序幕
- 坚守司法规律 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结束
- 以问题为导向 自我革命抓管理 改革永远在路上
- 记者手记

自认为”，我们以能动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迟到的正义，起码是打了折扣的正义。”会议以问题为导向，信息量很大，吹响“深化改革”冲锋号。长期以来，有些案件立案后迟迟不开庭，开庭后迟迟没有结果，裁判结果下来又迟迟得不到兑现，冗长的程序，旷日持久的官司，饱受诉讼诟病，即便是最高法也有多起久拖未结案件。

会议要求，全国法院往年未结民事、行政案件，审管办要向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清单；各高院院长应作为第一责任人，“挂牌督办”，年内要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不能审结的，10月底前向最高法汇报，疑难复杂积案沉在审委会的，要“唤醒”！

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支持了原告全部关于赔偿经济损失2.18亿元的诉求。这是目前人民法院针对同一工程项目判赔额最高的知识产权侵权关联案件。

该案涉及跨省多个企业，二审后C公司迟迟未履行停止侵权的责任，主管执行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秘书长刘贵祥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最高人民法院局长黄文俊，要求执行局全面了解情况提级执行抓督督办。

黄文俊介绍，该案是最高法办理的首起执行实施案件，是交叉执行和提级执行并用的典型案例，彻底改写了最高法不办执行实施案件的历史。

记者了解到，案件执行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高法会同地方，四级7个法院统一行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都到一线部署，也是首次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三省执行局局长现场执行，最终在执行中促成全面和解，侵权方获得使用许可，权利人最终获赔6.58亿元，刷新国内知识产权案件纪录，各方当事人同样获得利益最大化。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易继明认为，将违法使用转化为许可使用，案结事了，政通人和，都是彪炳史册的审判与执行均具典范作用。

“如我在诉，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让立案庭法官们感触颇深。张淑芳法官介绍，以往办案就是三段论，法律规定+法律事实，得出法律结果。现在更加充分理解“定分止争”，才是司法为民最好的呈现。

刘雪梅曾是业务部门法官，记者问她审判和信访是否完全不同的感觉？她坦言“确实太大了”，只有看到信访群众，亲自接待信访群众，才会深刻感受到法院的一纸文书会怎样影响“他人的人生”。接访中发现，有的裁判可能确实存在实质性错误，但很多判决本身正确，往往一句不那么恰当的表述，一项不尽清晰的执行内容，一段没有充分说理的结论，却让老百姓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

多位法官表示，开展访源治理，解决办案信访两张皮，真是抓到涉诉信访问题的根儿上了。

“涉诉信访问题是一件一件案子办完后产生的，也需要一件一件地真功夫化解，老百姓对于法院解决矛盾的诉求，期望也在逐年增加，说到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刘贵祥如是表示。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个颇为离奇的案件，F公司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未还，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银行同意在整体还款方案未确定之前，F公司每月偿还不少于1000元。后该债权转让给Z，每月收款1000元。后来，F公司获得土地拆迁补偿款625万元，Z要求F公司一次性偿还欠款拒绝还款，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协议书》约定内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本息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Z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债权已执行二十余年，在法院已查封600多万元的情况下，如不支持债权人起诉，案涉款项本息执行时间将长达200年，大过荒诞。

很多人也许不大理解为何新一届党组要提出执源治理？该案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你的判决能执行下去吗？”如果法官办案时能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以人民为中心”，在前端审判时就考虑到执行，也许就会杜绝“一案结而多案生”。

案件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晴雨表”，某一领域案件高发，意味着这个系统已经出现“红灯”现象，司法就要积极作出预警、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一房多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导致同一房屋不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形同虚设等，最高法向相关部门发出“一号司法建议”。

针对金融机构发卡、审查授信额度存在不尽规范的情况，每年约有350多万件案件诉至法院，费用有2900万件逾期不还客户，其中大量是年轻人，他们成为失信群体对社会稳定会有怎样的影响？最高法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二号司法建议”，协同推进信用卡纠纷源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但近年来，诉讼案件呈爆炸式增长，2023年全国法院收案4500多万件，较2013年增长2.4倍，“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更“水涨船高”。

最高法新一届党组深刻认识到，诉源治理光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并且要与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扩大诉源治理“朋友圈”。

比如某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一度高达95%，法院形成专题报告后报请党委政府，会同行政机关落实严格执法，当年即下降为63.8%。

她如或用作其他目的，我们就可以告知日后法院也会根据情况支持返还不当的彩礼，这更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石炳启感慨道。

“案例凝聚着司法的智慧，讲述了中国的法治故事，发布典型案例，统一法律适用，让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引领作用可见可感，体现了法院应有的担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评价。

小案见民心，所谓小案，就是那些常见多发、更贴近群众生活的各类案件。

家住南方某省M县的小张，打工前路过邻居家菜地，花122.5元接手70斤芹菜，卖给蔬菜批发商行后赚了14元，没想到这些菜竟然农超标，更没想到竟被罚款5万元！因为迟迟没有缴纳罚款，再被追加罚款5万元。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部门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涉案的金额在1万元以下，就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这种罚款，已经按最低的起罚点处罚，合法合规。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获利14元和罚款10万元构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10元处罚，跟本案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不匹配，违反了行政法处罚相当的原则，依法不予强制执行。

“这看似只是一起简单的行政案件，但案件背后反映出了诸多问题，切勿机械司法，才是更重要的价值所在。”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表示。

还有的“小案”触及社会争议性敏感话题，比如知假买假等，成为困扰性案件，对法官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军到民一庭调研时指出：与案例相比，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制定时间相对较长；对于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能及时发现典型案例，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依法作出裁判、发布出来，内容更通俗易懂，规范和引领效果也会更好。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彦芳介绍，最高法去年针对高额彩礼、知假买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新业态用工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和老百姓关注的重点问题，发布13批次共140个典型案例。

“面对理论和实践中长期争议的问题，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对于一些类案的不同裁判，最高法就要适时地总结并规范裁判标准。”陈彦芳如是解释。

长期以来，关于是否支持“知假买假”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原告“维权”行为动机的认定。2023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智慧地以客观标准认定“消费者”范围，坚持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买假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为保护食品安全和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按一千元赔偿。该法确立了“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实践中有人为牟取不当利益，利用上述规定，通过大量购买不合格商品达到高额索赔目的，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保护“消费者”规定精神，也引发了是否应当支持“知假买假”的争议。

最高法发布的郭某诉某经营部产品责任纠纷案中，原告先后共购买4件白酒，未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刘某诉某鹿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购买鹿胎膏、鹿鞭膏未超出生活消费需要。法院在这两案中均以购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款为计算基数，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最高法还发布了46张小票购买46枚咸鸭蛋案例，明确了只是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原告惩罚性赔偿请求的裁判规则。

张某诉上海某生鲜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张某接连两天分别购买6枚和40枚刚过保质期的熟咸鸭蛋，并刷卡支付46次，根据消费不足一千元按一千元赔偿的规定要求赔偿4.6万元。

法院认为张某涉诉行为不符合惯常消费习惯，不支持其不当诉讼请求。张某购买46枚咸鸭蛋，共支付价款101.20元，从总量的角度看，未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最后法院以总价款101.20元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对于这类案件的裁判，最高法指出：没有“引领”，“稳”就失去了意义；知假买假，有利制裁遏制假售假，老百姓高兴；同时有借机敲诈牟利，违法甚至构成犯罪；在“消费领域内”支持“买假”，则平衡了公众与商家、商家等多方利益与诉求。最高法多次强调要用好政治智慧、法治智慧、审判智慧，此案确立的规则应当为范例！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加海表示，通过案例让呆板的法条鲜活起来，统一了裁判尺度，树立了行为规则，让司法引领评价社会行为作用更加可见可感。

时间不语，却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东交民巷27号，因为是最高的人民法院所在地，被外界赋予了些许神秘与庄严的色彩，熟悉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院子还有一个“传奇”，或者一个“传说”。审判大楼正门共计31级台阶的中间，专门开出圆孔，一棵百年历史的皂角树生长于其中第15级台阶之北，被誉为“一棵‘长’在法律阶梯上的老树，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鲜活的司法图腾和叙事传说。”

2023年3月15日下午，这棵古树再次见证了历史一刻，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第11位院长正式上任。

3月1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扩大会议上，张军第一次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一位参加会议的庭长对记者回忆，“其实在座的多数人与院长是认识的，但会场异常安静，大家并不是很轻松，新任首席大法官的讲话让人充满期待又倍感压力”。

也就是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最高法党组第一次提出“讲政治、促公正、提效率、强队伍”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是厚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也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使命。

“‘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这是老院长肖扬2001年公开首提，新一届党组没有“折封”“地照搬”过来，认为是人民法院永恒的工作主题！

“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绝不是来‘走程序’的。程序合乎规范，同时能实质解决问题，案结事了，才是诉讼的目的，才能体现诉讼的价值。”张军特别强调。

如何答好司法工作人民满意的时代问卷？3月23日，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以四级法院同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指出，民生案件虽“小”，却关系“大”政治，必须用心用情办好，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要久久为功依法化解群众诉求，着力解决立案、诉讼、执行、信访等环节难点堵点问题，加快推进“有信必复”，持续推进涉诉信访源头治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向东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报到的张军，在内外看来，对法院工作都是“门儿清”。会议上他特别提到一些法院年底不收案以及有的司法数据不实问题。部一个中级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给他发信息感叹：基层苦于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久矣！

会议明确提出最高法将重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质量指标评价体系。这次会议还强调，必须做实诉源治理，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不仅要办好每一个案，更要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强化综合治理，从根本上减少案件发生。

张军讲到自己在检察机关工作时到某地调研的一起案例。“一位老人家中患有精神障碍的儿子，砸坏手机，老人无法扫码进入商场，在超市门口偷取别人购买的一些食物；儿子咳嗽，在药店门口把别人车筐里的药物偷走，价值虽然不足千元，却已够‘多次’，最后被以盗窃罪判了缓刑。公安抓、检察诉、法院判，社矫人员则抱怨为何不判个实刑，没有手机怎么监管？”

面对司法人员办案的冷漠，调研组成员深感痛心，当地党委书记说：这是我们在犯罪啊！政法委就此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教育整顿工作。

许多老法官，与会的多人人大代表听到这个案例后，很受触动，认为这是一次讲政治、顾大局更接地气的会议，深感办案理念必须转变。

此次会议向全系统发出灵魂追问：“我们的法官判案时心中是否有人民？只是机械办案、就案办案吗？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感受公平正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法官

理念一新天地宽。

最高法新一届党组深入各庭室局和若干地方法院密集调研后，2023年4月10日在国家法官学院春季开学典礼上，引起高度关注地提出做深做实新时代能动司法。

什么是能动司法？会议特别指出，新时代能动司法，是立足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审判中真正做到“讲政治顾大局，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仅仅着力于结案数量、结案率，还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努力实现“抓前端、治未病”，会议特别指出，能动绝不是“主动”更不是“乱动”。

2024年2月2日，记者与最高法执行局局长刘永存、四川高院执行局局长周磊一同前往四川A企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非常激动地讲述了企业发展史和艰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发展“生死存亡”的重要性。

该案历时多年，不仅中国同行，世界同行也高度关注。“从审判到执行，从审判期间法官固定证据的创新到执行和解全国多个法院法官们的努力，让我们与被告人企业从最初的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都是彪炳史册的，我们全球最大的德国合作伙伴是业内翘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信心。”70多岁的董事长由衷赞叹。

两案裁判不仅彰显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也充分体现对内外资和外企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的一体对待、平等保护。“该案审判与执行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意义重大、深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马一德评价。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南四环小红门乡红寺村，位于北京南城，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所在地。记者多年前曾去过立案庭定案点所在地采访，记得那个时候满院子都是人，叫到申请人的号码跟农村大喇叭广播似的。

多年过去，老百姓现在上访，在现场，不仅有了宽敞明亮的诉服大厅，还可以坐在家通过信访平台网上申诉，也可以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一号通办”，愿意的话，又可就近去家门口的法院信访，通过远程视频尽诉案情，便民为民的信访条件有了根本改善。

2024年元旦过后，记者来到立案庭，刘雪梅副院长介绍，“人民群众涉诉信访环境从走泥巴路、道边理锅造饭、门口蹲点守候、排长龙等待接待，已经实现了‘厅、网、线、巡、视’的信访接待”。

作为人民法院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12368诉讼热线从过去的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一个值班员，升级为“一号通办”群众各类诉求的“总客服”。全国法院日均接听办结群众来电8.31万件次。12368热线要求对群众来电做到100%接听，如果是在来电高峰期因为忙线未能接听的，最高法会在当日自动回拨给来电当事人，做到有电必接、来电必回。

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对记者特别介绍了全国法院线上诉讼服务满意度评价体系，该系统对全国3500多家法院和诉讼服务各项业务全覆盖，全流程接受群众好评。

记者惊讶地发现，系统显示，对发达城市法院差评更多，其中一条差评理由是：“你们这是办的事儿吗？”记者问：“对于这样的评价你们怎么解决？”钱晓晨表示，这是很激烈的不满表示，我们会即时跟踪，系统内

“有信必复”直接联系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我们给别人发个短信都希望对方回复，何况老百姓认为权益受损、司法不公的来信呢？”张军推心置腹地与立案庭法官交流。

“如我在诉，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让立案庭法官们感触颇深。张淑芳法官介绍，以往办案就是三段论，法律规定+法律事实，得出法律结果。现在更加充分理解“定分止争”，才是司法为民最好的呈现。

刘雪梅曾是业务部门法官，记者问她审判和信访是否完全不同的感觉？她坦言“确实太大了”，只有看到信访群众，亲自接待信访群众，才会深刻感受到法院的一纸文书会怎样影响“他人的人生”。接访中发现，有的裁判可能确实存在实质性错误，但很多判决本身正确，往往一句不那么恰当的表述，一项不尽清晰的执行内容，一段没有充分说理的结论，却让老百姓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

多位法官表示，开展访源治理，解决办案信访两张皮，真是抓到涉诉信访问题的根儿上了。

“涉诉信访问题是一件一件案子办完后产生的，也需要一件一件地真功夫化解，老百姓对于法院解决矛盾的诉求，期望也在逐年增加，说到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刘贵祥如是表示。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个颇为离奇的案件，F公司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未还，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银行同意在整体还款方案未确定之前，F公司每月偿还不少于1000元。后该债权转让给Z，每月收款1000元。后来，F公司获得土地拆迁补偿款625万元，Z要求F公司一次性偿还欠款拒绝还款，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协议书》约定内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本息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Z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债权已执行二十余年，在法院已查封600多万元的情况下，如不支持债权人起诉，案涉款项本息执行时间将长达200年，大过荒诞。

很多人也许不大理解为何新一届党组要提出执源治理？该案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你的判决能执行下去吗？”如果法官办案时能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以人民为中心”，在前端审判时就考虑到执行，也许就会杜绝“一案结而多案生”。

案件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晴雨表”，某一领域案件高发，意味着这个系统已经出现“红灯”现象，司法就要积极作出预警、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一房多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导致同一房屋不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形同虚设等，最高法向相关部门发出“一号司法建议”。

针对金融机构发卡、审查授信额度存在不尽规范的情况，每年约有350多万件案件诉至法院，费用有2900万件逾期不还客户，其中大量是年轻人，他们成为失信群体对社会稳定会有怎样的影响？最高法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二号司法建议”，协同推进信用卡纠纷源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但近年来，诉讼案件呈爆炸式增长，2023年全国法院收案4500多万件，较2013年增长2.4倍，“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更“水涨船高”。

最高法新一届党组深刻认识到，诉源治理光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并且要与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扩大诉源治理“朋友圈”。

比如某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一度高达95%，法院形成专题报告后报请党委政府，会同行政机关落实严格执法，当年即下降为63.8%。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今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一个规定迅速冲上热搜，网友讨论热度很高，它的名字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介绍，涉彩礼案件难办在两个难点：一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二是仅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即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这两类案件无法适用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比例各地裁判不一，有的一审判了，有的二审改判了，成为审判实践的堵点。

难以想象，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都提出了要求。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上升已成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为回应人民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本《规定》。

这个《规定》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的高度关注。作为一名退伍多年的老军人，早在2018年秋天，石炳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对村里旧俗走向极端很是震惊，当时村里的彩礼最高有30多万元，而且越是贫困的家庭，彩礼钱越高。而村民人均收入只有3万元，互相攀比彩礼的歪风，让家有喜事村民很无奈，多是苦不堪言。

石炳启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制定村规约改变风俗，可他又不清楚法律应该何支何支。河间法院便指派法官到大庄村进行指导，全程参与村规约制定。根据法律法规，大庄村最终将彩礼数额界定为5万元以下为“低彩礼”，2万元以下为“零彩礼”。

1月23日，记者前往大庄村采访，石炳启表示，所谓“零彩礼”并不是指结婚一分钱不花，而是除去买礼物和购置生活用品的费用，把2万元以下界定为“零彩礼”。

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就是司法服务的切入点。记者发现，关于红白事改革的22条规定，一直悬挂在村委会的墙上，滚动在电子屏上。河间法院院长刘致明介绍，在法院指导下，大庄村将红白理事工作纳入两委班子管理，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红白理事会会长。基层党组织发力，将高额彩礼纳入基层治理范畴，大庄村的婚俗改革很快见到成效。

无疑，这个婚俗改革过程十分艰难。石炳启对记者讲述了他去女方家做工作被骂出来以及男方听说女方悔婚婚事抱怨他多管闲事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最高法制定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既尊重传统习俗，又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烟索取财物，依法治理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既引领社会风尚，更解决实质问题。

“这也为我们今后做调解工作指明了方向，比如有的女方索要高额彩礼是为给儿子娶

“有信必复”直接联系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我们给别人发个短信都希望对方回复，何况老百姓认为权益受损、司法不公的来信呢？”张军推心置腹地与立案庭法官交流。

“如我在诉，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让立案庭法官们感触颇深。张淑芳法官介绍，以往办案就是三段论，法律规定+法律事实，得出法律结果。现在更加充分理解“定分止争”，才是司法为民最好的呈现。

刘雪梅曾是业务部门法官，记者问她审判和信访是否完全不同的感觉？她坦言“确实太大了”，只有看到信访群众，亲自接待信访群众，才会深刻感受到法院的一纸文书会怎样影响“他人的人生”。接访中发现，有的裁判可能确实存在实质性错误，但很多判决本身正确，往往一句不那么恰当的表述，一项不尽清晰的执行内容，一段没有充分说理的结论，却让老百姓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

多位法官表示，开展访源治理，解决办案信访两张皮，真是抓到涉诉信访问题的根儿上了。

“涉诉信访问题是一件一件案子办完后产生的，也需要一件一件地真功夫化解，老百姓对于法院解决矛盾的诉求，期望也在逐年增加，说到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刘贵祥如是表示。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个颇为离奇的案件，F公司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未还，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银行同意在整体还款方案未确定之前，F公司每月偿还不少于1000元。后该债权转让给Z，每月收款1000元。后来，F公司获得土地拆迁补偿款625万元，Z要求F公司一次性偿还欠款拒绝还款，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协议书》约定内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本息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Z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债权已执行二十余年，在法院已查封600多万元的情况下，如不支持债权人起诉，案涉款项本息执行时间将长达200年，大过荒诞。

很多人也许不大理解为何新一届党组要提出执源治理？该案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你的判决能执行下去吗？”如果法官办案时能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以人民为中心”，在前端审判时就考虑到执行，也许就会杜绝“一案结而多案生”。

案件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晴雨表”，某一领域案件高发，意味着这个系统已经出现“红灯”现象，司法就要积极作出预警、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一房多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导致同一房屋不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形同虚设等，最高法向相关部门发出“一号司法建议”。

针对金融机构发卡、审查授信额度存在不尽规范的情况，每年约有350多万件案件诉至法院，费用有2900万件逾期不还客户，其中大量是年轻人，他们成为失信群体对社会稳定会有怎样的影响？最高法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二号司法建议”，协同推进信用卡纠纷源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但近年来，诉讼案件呈爆炸式增长，2023年全国法院收案4500多万件，较2013年增长2.4倍，“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更“水涨船高”。

最高法新一届党组深刻认识到，诉源治理光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并且要与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扩大诉源治理“朋友圈”。

比如某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一度高达95%，法院形成专题报告后报请党委政府，会同行政机关落实严格执法，当年即下降为63.8%。

“有信必复”直接联系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我们给别人发个短信都希望对方回复，何况老百姓认为权益受损、司法不公的来信呢？”张军推心置腹地与立案庭法官交流。

“如我在诉，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让立案庭法官们感触颇深。张淑芳法官介绍，以往办案就是三段论，法律规定+法律事实，得出法律结果。现在更加充分理解“定分止争”，才是司法为民最好的呈现。

刘雪梅曾是业务部门法官，记者问她审判和信访是否完全不同的感觉？她坦言“确实太大了”，只有看到信访群众，亲自接待信访群众，才会深刻感受到法院的一纸文书会怎样影响“他人的人生”。接访中发现，有的裁判可能确实存在实质性错误，但很多判决本身正确，往往一句不那么恰当的表述，一项不尽清晰的执行内容，一段没有充分说理的结论，却让老百姓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

多位法官表示，开展访源治理，解决办案信访两张皮，真是抓到涉诉信访问题的根儿上了。

“涉诉信访问题是一件一件案子办完后产生的，也需要一件一件地真功夫化解，老百姓对于法院解决矛盾的诉求，期望也在逐年增加，说到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刘贵祥如是表示。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个颇为离奇的案件，F公司向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未还，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银行同意在整体还款方案未确定之前，F公司每月偿还不少于1000元。后该债权转让给Z，每月收款1000元。后来，F公司获得土地拆迁补偿款625万元，Z要求F公司一次性偿还欠款拒绝还款，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协议书》约定内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本息等。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维持。Z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债权已执行二十余年，在法院已查封600多万元的情况下，如不支持债权人起诉，案涉款项本息执行时间将长达200年，大过荒诞。

很多人也许不大理解为何新一届党组要提出执源治理？该案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你的判决能执行下去吗？”如果法官办案时能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以人民为中心”，在前端审判时就考虑到执行，也许就会杜绝“一案结而多案生”。

案件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晴雨表”，某一领域案件高发，意味着这个系统已经出现“红灯”现象，司法就要积极作出预警、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一房多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导致同一房屋不同财产权利发生冲突，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形同虚设等，最高法向相关部门发出“一号司法建议”。

针对金融机构发卡、审查授信额度存在不尽规范的情况，每年约有350多万件案件诉至法院，费用有2900万件逾期不还客户，其中大量是年轻人，他们成为失信群体对社会稳定会有怎样的影响？最高法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二号司法建议”，协同推进信用卡纠纷源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但近年来，诉讼案件呈爆炸式增长，2023年全国法院收案4500多万件，较2013年增长2.4倍，“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更“水涨船高”。

最高法新一届党组深刻认识到，诉源治理光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并且要与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扩大诉源治理“朋友圈”。

比如某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一度高达95%，法院形成专题报告后报请党委政府，会同行政机关落实严格执法，当年即下降为63.8%。